

“双减”政策落地与新的教育不公平

——基于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付卫东 郭三伟

【摘要】“双减”政策落地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却引发了一些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或将进一步拉大学生学业成就差距,课后服务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城乡教育差距,教学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加剧校际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多重因素交叠作用催生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已有的教育差距是造成课后服务质量差距和教学质量差距扩大的重要致因;“双减”政策执行偏差进一步加剧课后服务质量差距和教学质量差距。为此提出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治理,深入破解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难题;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缩小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

【关键词】“双减”政策;教育不公平;义务教育;教育差距;教育公平

【作者简介】付卫东,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郭三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摘自《现代教育管理》(沈阳),2024.4.42~5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学校劳动教育与农耕文化传承的耦合机理及路径研究”(20XSH06)。

2022年3月至6月,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对广东、浙江、湖北、湖南、四川、贵州6省30个县(市、区)的部分中小学师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学生问卷8436份,家长问卷8444份,教师问卷1290份,同时对部分师生和家长进行了结构性访谈。分析后发现,在“双减”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或将直接影响“双减”政策成效和教育公平。

一、问题检视: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一)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或将进一步拉大学生学业成就差距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多措并举,加大对校外培训的治理力度,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主要表现为:学科类培训机构被大幅压减,培训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培训行为得到全面规范,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明显减轻,教育生态持续向好。课题

组调查数据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25.3%的学生参与学科类培训,32.7%的学生参与非学科类培训,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较“双减”政策实施前大幅下降。但是,在“双减”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培训机构由“地上”转入“地下”,改头换面,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严重干扰政策执行,阻碍改革推行^[1]。各地在开展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工作中,累计排查发现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3598个,“一对一”等个人违规开展培训1572人次,其中涉及中小学在职教师15人^[2],这表明,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客观存在,不容忽视。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仍有6.4%的学生参加了一对一线下学科培训,8.2%的学生参加了一对一线上辅导,3.1%的学生参加了上门家教补习。

“双减”政策实施后,随着大批校外培训机构的关停和转型,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价格随之“水涨船高”,收费高昂,这直接将普通家庭子女和低收入家庭子女拒之门外,而中高收入家庭则可以凭借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优势高价聘请“一对一家教”“住家教师”等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子女的学业成就优势,进而将普通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子女远远甩在身后。从文化再生产理论视角来看,虽然“双减”政策对学科类培训进行打击,但由于存在中高考压力、普职分流压力等原因,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更易于且更倾向于让其子女获得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机会,进而持续进行文化再生产,以巩固和保持其阶层优势。若长此以往,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或成为“双减”背景下新的传递不平等的工具。

(二)课后服务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城乡教育差距

课后服务作为落实“双减”政策和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的重要举措,旨在解决家长接送难题,取代校外培训成为学生课后生活的重要内容,进而缩小学生课后成长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然而,课题组的调查发现,课后服务质量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且这种差距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若不加以缓解,长此以往,课后服务的实施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已经存在的教育鸿沟。有学者指出,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实践过程中并未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甚至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例如,不仅没有为乡村学生“减负”,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课业负担,这些消极影响有悖于开展课后服务的初衷,最终也将加剧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3]。

本研究认为,课后服务质量差距主要表现在经费、师资、内容、场地、设施设备等方面。实地调研发现,在经费方面,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能获得的地方政府经费支持相对不足,且许多农村学校经费本就入不敷出,难以保障课后服务的高质量开展。在师资方面,与城市学校相比,许多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音体美等专业教师匮乏,且难以像城市学校一样可以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学生志愿者、志愿团体等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在内容方面,以“1+X”为例,城市学校的“X”往往较为丰富多样,学生不仅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作业,还可以参与

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进而实现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而农村地区许多学校的“X”较为单一,甚至没有,学生往往以完成作业为主,部分学校甚至异化为补课,这不仅没有减轻学生负担,反而延长了学生在校时间,增加了学生负担。在场地及设施设备方面,城乡差距也十分明显。许多农村学校的操场、舞蹈房、钢琴房等设施和设备配置不足,因此,在开展一些文体文艺活动时显得捉襟见肘。此外,学生对课后服务的认同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课后服务质量在城乡之间的差距(见下页表1)。本研究针对学生对课后服务不同维度的认同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点计分)进行了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对课后服务不同维度的认同度上,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学生对课后服务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三)教学质量差距或将进一步加剧校际差距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教育回归校园,让学校充分发挥育人主阵地作用。随着国家对校外培训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校外培训在学生成长发展中的作用被大幅削弱,学校教育在学生成长发展中的作用被大幅提升,因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也就成为了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学校要在教育教学上下功夫,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然而,课题组在多次实地调研中发现,与城市学校多措并举提升教学质量相比,许多农村地区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却止步不前。长此以往,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将会被进一步拉大。

调研发现,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在作业设计、课堂教学改革、教研质量提升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作业设计方面,“双减”政策实施后,许多优质学校凭借其拥有的优质资源进行作业革命,加强作业研讨,注重减量提质,而许多薄弱学校则仍是沿袭传统的作业设计与布置方式,或是仅简单地减少作业量而非在减量的同时注重提质。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双减”背景下许多优质学校积极探索,改进教学方式,优化教学模式,加强教学管理,向课堂45分钟要质量,而许多薄弱学校仍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在教研质量提升方面,“双减”后众多优质学校充分依托

题项	类别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t 值
课后服务时老师教学态度良好	城市	3204	4.15	0.98	5.039***
	农村	4323	4.04	0.95	
课后服务可供选择的类型十分丰富	城市	3181	3.70	1.24	3.935***
	农村	4311	3.58	1.19	
学校课后期间能够使用的设备非常丰富	城市	3161	3.60	1.20	4.427***
	农村	4300	3.48	1.15	
我会积极参与课后服务	城市	3179	4.10	0.96	7.425***
	农村	4298	3.94	0.93	
我能够在课后服务中获得很多乐趣	城市	3174	3.89	1.11	3.426***
	农村	4296	3.80	1.06	
我对当前的课后服务非常满意	城市	3162	3.97	1.04	7.411***
	农村	4294	3.79	1.03	
我觉得课后服务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城市	3163	3.40	1.27	6.313***
	农村	4292	3.21	1.24	

注：***表示 $p<0.001$ 。

其优质的教研团队就作业设计、教学改革等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更新教师教学理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力推动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与优质学校相比,许多薄弱学校则难以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且教研活动质量普遍不高。

二、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多重因素交叠作用催生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

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从供给角度看,培训机构是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供给主体。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存在反映了“双减”后仍有部分资本和机构为逐利并未撤离教培领域,而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从事学科类培训。在政府的监管下,这些培训机构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只能不断变换马甲,逃避监管。

从需求角度看,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存在表明了部分家长和学生的培训需求依然强劲。驱使部分家长和学生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部分家长的教育观念存在偏差。部分家长存在短视化、功利化问题,“唯分数”思想根深蒂固,“双减”后不愿放弃学科补习,而是仍寄

希望于通过参与学科类培训保持和巩固子女的学业成绩。有研究显示,高达 87% 的受访家长表示不会因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而放弃子女的校外学科类补习,同时,有 37% 的家长愿意接受一对一(或小班化)家教作为校外培训机构的替代形式。^[4]二是学校教育难以满足学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学校教育不仅没有铲除社会的不平等,相反,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5]学校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和维持了社会的不平等,但因其普遍采取的班级授课制组织形式,学校教学质量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提升,故难以满足部分家庭补弱培优的现实需求。在国家对学科类培训进行严管的形势下,这部分家庭往往会选择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通过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持续进行文化再生产,这正如前文所说,“双减”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或已成为除学校教育之外的新的文化再生产工具。三是基础教育内部存在不平等竞争与筛选机制。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如果数量差异普遍存在,社会经济优势群体将获得数量优势;如果质量差异普遍存在,社会经济优势群体将获得质

量优势。社会经济优势群体将利用他们的社会经济优势来确保其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更好的结果。^[6]当前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评价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且在普职分流的现实压力下,为了获得和扩大不平等的竞争优势,具有社会经济优势的家庭必将选择继续让子女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通过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获取更高质量的教育,继而有效维持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上的不平等。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利益相关者看似形成了减负共识,但一旦涉及学业成绩、升学考核等,便会与政策逆行。^[7]四是受教育外部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学生们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数据显示,2024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79 万人,同比增加 21 万人。^[8]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会传导至每个家庭,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长的焦虑情绪,加大了部分家庭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可能性。此外,诸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用人单位存在唯学历用人导向等其他社会因素也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家长新的焦虑情绪,驱使部分家长参与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以取得优异成绩和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二)已有的教育差距是造成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扩大的重要致因

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在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这种差距不断被拉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本就存在着较大的教育差距,突出地表现在经费差距、办学条件差距和师资力量差距三个方面。

一是经费差距。从城乡来看,受制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优先”理念,我国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在办学经费上仍有着较大的差距。已有研究表明,农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经费支出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呈现出逐年加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现。^[9]从校际来看,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在办学经费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对陕西省 N 县的调查结果显示,某乡村小规模学校每年办学经费仅有 10 万元,办学经费十分紧张,而与之相对应的县城

中心小学每年公用经费有 160 万元,办学经费比较充足。^[10]办学经费的差距是导致课后服务质量在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农村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办学经费仅能维持日常教育教学,难以支撑课后服务的运转。

二是办学条件差距。尽管近些年国家在不断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改善农村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但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差距依然较大。办学条件的差距也是导致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在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实地调研中发现,一些农村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在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面临着场地、设施设备不足的窘境,只能开展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难以满足学生多方面兴趣发展的需要。

三是师资力量差距。尽管近些年国家通过“特岗计划”“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国培计划”等政策不断加强乡村教师培养培训,但受制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城乡教育和环境差距等,我国城乡师资力量差距依然明显。与城市学校相比,我国农村学校还面临着师资流失严重、专任教师不足、师资队伍老化、师资学历偏低等问题。师资力量差距是导致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关键原因。调研发现,许多农村学校音体美等专业教师不足,且专业素养普遍不高,难以满足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提升的需要。

(三)“双减”政策执行偏差进一步加剧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

从“双减”政策执行的实践情况看,“双减”政策在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执行较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方面都有较大提升,但在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双减”政策的执行则并没有带来较大的改变。“双减”政策在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执行存在浅表化现象,政策执行不够深入,导致课后服务质量不高,教学质量提升缓慢。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双减”政策执行存在浅表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部分地区政策执行存在一刀切问题。部分地区忽视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异,在作业减负、课后服务等

方面一刀切,导致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导致执行政策浅表化。例如,有些地方强制要求所有学校统一实行“5+2”形式的课后服务,而部分薄弱学校不具备开展这种形式课后服务的条件;有些地方在课后服务时间上一刀切,强制规定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导致一些学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太晚,同时也加重了教师负担。二是学校面临资源匮乏的窘境。与城市学校相比,许多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面临经费、设施设备、师资不足的困境,难以支撑课后服务的开展。例如,课后进行音体美等兴趣活动需要具备相应功能的教室和专业的设备,但许多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三是政策执行者观念落后。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部分乡村学校政策执行者的“唯分数”“唯升学率”观念依然强劲,他们对“双减”政策的认同度不高,进而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四是未能进行合理补偿。教育公平包含教育资源配置的补偿原则,即关注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并对社会经济地位处境不利的受教育者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予以补偿。^[11]根据弱势群体补偿原则,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在“双减”政策执行中处于弱势地位,应予以合理补偿。然而,许多地区在执行“双减”政策时未能对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进行合理的补偿,导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五是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不完善。关于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教师补助发放、校外师资聘请与管理和课后服务监督与评价等配套政策不完善,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也有研究指出,乡村学校课后服务政策设计存在滞后性和配套性差等问题,既缺乏必要专项经费作为支持,也缺失配套性制度联动改革,更缺乏相关监督机制建设。^[12]

三、解决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策略

(一)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治理,深入破解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难题

其一,加强供给侧治理。国家和各地政府应及时跟进校外培训治理形势的变化,将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治理摆在校外培训治理的突出位置,严排查,出重拳,重打击,有效遏制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

蔓延势头。一是要畅通和拓宽隐形变异违规培训监督渠道。各地应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通过设置专门监督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多种方式健全群众监督举报机制,并加强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监督举报渠道的知晓度,探索设立举报奖励基金和匿名举报奖励制度。^[13]各地可将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纳入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格筛选和排查,拓宽违规培训线索来源渠道。二是要健全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机制,进一步推动各区县建立健全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机制,并充分发挥鉴别机制作用,精准识别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行为。三是加强教育行政执法,进一步加大对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执法力度,对其实行严罚重处并形成有效震慑。国家应进一步加快推进校外培训监管立法,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各地应进一步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建设,增强执法力度,完善联合执法机制,提高执法效能。

其二,加强需求侧治理。进一步调节和缓解家长及学生的培训需求,减少家长及学生对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的依赖。一是积极转变家长观念。坚持国家教育发展理念,引导家长调适心态,修复功利性主宰的社会教育观念系统,敦促家长真正理解、认同、接受科学的育人观念,才是“双减”政策内涵充实与持续增能之路。^[14]应积极宣传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加强“双减”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家长学习和落实“双减”政策。学校应充分利用家长委员会、家长会等途径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家庭教育的协同支持作用,引导家长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二是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应注重优化教学方式,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并努力满足不同学生差异化的学习需求。教师应加强自身学习,提高专业素养,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并针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制定差异化的教学策略,因材施教,努力解决部分学生“吃不饱”和部分学生“跟不上”的问题。三是弱化基础教育内部竞争与筛选机制。各地应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坚决破除“五唯”痼疾,进一步推进中高考改

革,提高命题质量,让现有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失去效用,让“题海战术”“机械训练”等无法成为提高高考分数的有效方式^[15]。各地还应稳妥审慎推进“普职比”改革,做好政策解读,避免引起家长新的教育焦虑。四是优化教育外部环境。教育与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协作,加强就业政策解读、就业岗位推荐、就业困难帮扶,引导大学生合理预期,帮助大学生就业。有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营造和谐温暖的社会氛围,增加社会群众生活幸福感。积极引导用人单位改变“唯名校”“唯学历”等观念,树立能力导向,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

(二)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

第一,大力缩小经费差距。当前,应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始终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予以优先保障,并重点向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学校倾斜,推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均衡配置。进一步优化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加大省级统筹力度,让省级政府成为义务教育最重要的财政责任承担者^[16],努力缩小省域内义务教育差距。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偏远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处理好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有序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高专项转移支付投放精度,并加强对转移支付的监管^[17],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对促进义务教育财政均衡配置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经费使用的监督与管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益。

第二,大力缩小办学条件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缩小城乡、校际办学条件差距。各地应因地制宜拟定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指标的下限和上限,并无条件严格遵守下限底线^[18],加快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继续实施“全面改薄”行动,优化和改进薄弱学校办学条件。^[19]进一步加强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教学仪器设备配备、信息化设备配置、功能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室配备等,全面提高设施设

备配置水平。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设施设备的监管,提高学校设施设备的利用效率,避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第三,大力缩小师资差距。深入落实“特岗计划”“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加强乡村教师培养,为乡村教育发展培养和储备更多优秀人才。持续实施“国培计划”等教师培训项目,加强乡村教师培训,突出培训实效,提升培训质量。加大乡村音体美等专业教师的招聘和培养力度,努力弥补音体美等专业师资空缺。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努力改善乡村学校工作环境,采取更多优惠举措和关爱举措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深入推进教师交流轮岗,努力解决轮岗教师困难,保障轮岗教师待遇,促进更多优秀师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

(三)优化“双减”政策执行,缩小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

当前,为了进一步推动“双减”政策落地,应优化和加强“双减”政策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的执行,矫正执行偏差,努力克服浅表化问题,推动“双减”政策在这些地区和学校的执行真正取得实效,进而缩小因政策执行偏差带来的城乡之间、学校之间课后服务质量和教学质量差距。

一是因地制宜执行“双减”政策。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统筹考虑城乡、校际差异,因地制宜落实“双减”政策,尽量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问题。在执行“双减”政策上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让学校在课后服务时间、内容、作业管理、教学改革等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鼓励和支持学校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开展差异化和特色化的课后服务、作业减负和教学改革等。

二是加大资源保障力度。根据课后服务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应构建政府负担与面向家长收费相结合的课后服务经费分担模式,其中,政府应切实负担起主要部分。各地应将课后服务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上,并进一步加强课后服务的收费监管,杜绝乱收费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可组织优质学校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鼓励和支持师范专

业实习生、大学生支教团、志愿者、社会专业人士、民间艺人、退休教师等协助乡村薄弱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三是强化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知。为进一步提高“双减”政策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的执行效果,应强化政策宣传,组织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集中学习和专题学习,引导学校领导和教师深刻理解和认识“双减”政策的内涵及价值,引导一线教师正确理解和看待学生减负与教学提质的辩证关系,引导学校教师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自觉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率”等观念。

四是加强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的补偿。各地在执行“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补偿原则,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进行合理的补偿,以缩小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在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要注意在经费、设备等方面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进行合理倾斜和补偿,同时对于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免除课后服务费用。

五是完善配套政策和制度。“双减”政策落地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取得成功,就更要注重完善配套政策制度。例如,在课后服务开展的前期,要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明确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科学安排课后服务内容;在课后服务开展的过程中,要制定和完善课后服务各项管理制度;在课后服务的后期,即学期末或学年末,要制定和完善课后服务评价方案。此外,还应明确教师补助发放的具体标准,明晰对聘请的校外师资如何进行服务与管理等。只有根据课后服务实践的不断变化动态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制度,才能推动课后服务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就《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答记者问[EB/OL]. (2021-09-08)[2023-10-2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109/t20210908_560765.html.

[2]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顺利完成

并取得积极成效[EB/OL]. (2022-08-10)[2023-10-2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10_651989.html.

[3]何经纬,严登才.“脱嵌与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基于皖北S镇初级中学的个案研究[J]. 基础教育,2022,19(3):59-68.

[4]余晖.“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J]. 南京社会科学,2021(12):145-153.

[5]朱伟珏.一个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J]. 社会科学,2006(5):106-117.

[6]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 1642-1690.

[7]薛二勇,李健,刘畅.“双减”政策执行的舆情监测、关键问题与路径调适[J]. 中国电化教育,2022(4):16-25.

[8]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部署做好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EB/OL]. (2023-12-05)[2023-10-2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312/t20231205_1093287.html.

[9]丁向东,李贵成.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实现理路[J]. 河南社会科学,2022,30(9):118-124.

[10]赵丹,曾新.以“资源共享”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因、问题与对策[J]. 教育与经济,2022,38(1):41-48.

[11]褚宏启.关于教育公平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 中国教育学报,2006(12):1-4.

[12]白雪,李广,王奥轩.乡村学校课后服务政策执行的偏差与治理[J]. 教育学术月刊,2022(8):94-102.

[13]周洪宇,齐彦磊.“双减”政策落地:焦点、难点与建议[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1):69-78.

[14]龙宝新,赵婧.“双减”政策破解义务教育内卷化困境的机理与路向[J]. 现代教育管理,2022(4):20-29.

[15]周序.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7(6): 96-106.

[16]范先佐,郭清扬,付卫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省级统筹[J]. 教育研究,2015,36(2):67-74.

[17]付卫东,周威.转移支付能否缩小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基于6省18县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21, 37(6): 53-61.

[18]范先佐.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义务教育发展问题与策略:基于4个省(自治区)部分县市的调研[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3(4): 139-146.

[19]周霖,周常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薄弱学校发展的政策演进与优化路径[J]. 教育科学,2021,37(6):7-13.